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 吕梁市孝义市卷(上)

主编 杜红涛 副主编 王正树

执行主编 田雨海



总 主 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国家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晋石刻大全



● 吕梁市孝义市卷(上)

主编 杜红涛 副主编 王正树

执行主编 田雨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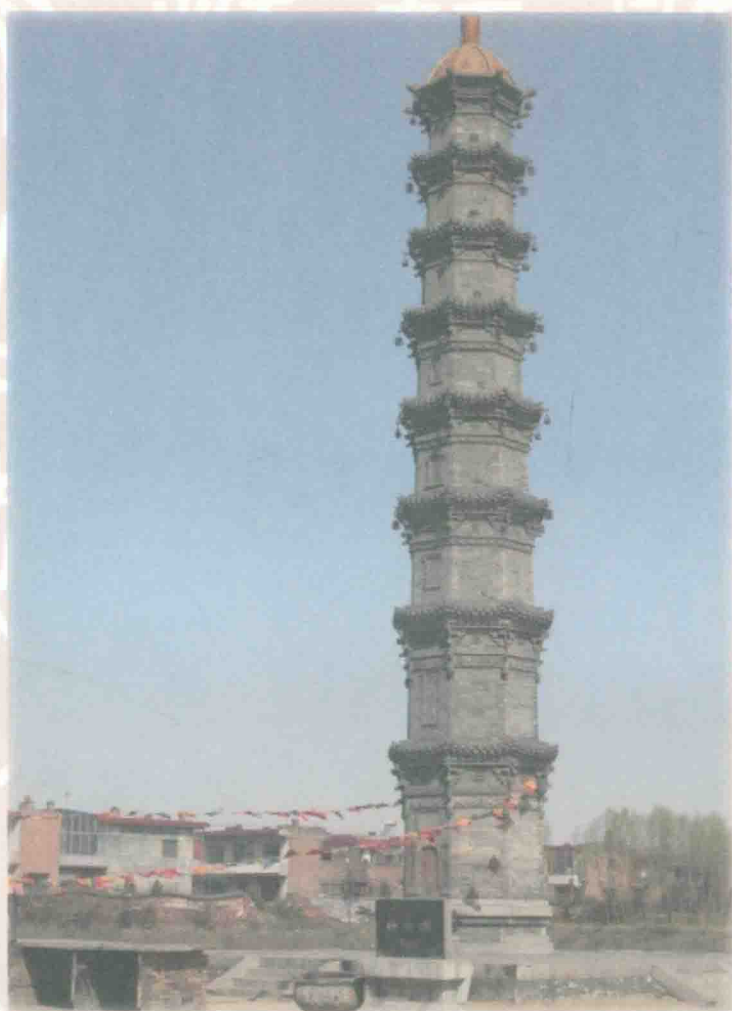


总主编 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 李玉明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封扉题签：姚奠中



《三晋石刻大全》编纂委员会

顾问：薛延忠 金道铭 申维辰 申联彬 李小鹏 高建民 胡苏平
张平 李立功 胡富国 白清才 郭裕怀 杨安和 李学勤
姚奠中 张正明 令政策 李潭生 刘江 张颌

主任：刘泽民

常务主任：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刘在文 田中仁 雷忠勤 柴泽俊 刘纬毅
降大任 郭士星 赵望进 杨子荣 储仲君 邢利斌 梁俊明
张玉洁 崔正森 贾玉瑞 翁小绵 陈明 于贵卿 宋新梅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敏政 石金鸣 史耀清 刘光彦 刘合心 齐荣晋 张鸿仁
吴广隆 李尧 李非 李小强 高可 董占锁 董瑞山
潘孝忠 霍润德

总主编：刘泽民
执行总主编：李玉明

副主任：罗广德 李茂盛 杨子荣 文琴 张继红 落馥香

审定：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编撰指导组成员

顾问：高卫东 丁雪峰

组长：吕改莲 成锡锋

副组长：闫玉平

执行组长：刘光彦

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弓寨明 王书平 王月明 达月明 任学中 任建明 安琪 孙晋军
杜旭华 李俊有 贺兴国 袁秀敏 董楼平 靳佩荣 薛波

《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孝义市卷》编委会

主任：张旭光 郭保平

副主任：薛虎平 焦张生 李安 薛向东 杜红涛 王正树

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明高 马夏民 王有名 王志东 王建国 田曜 田云年 田世升
田雨海 叶圣辉 刘秋生 刘建武 张久珠 张玉田 张贵森 吴晓娟
宋福荣 武俊川 赵钟 赵心艳 侯燕 康蕊 梁通达 庾光祖

主编：杜红涛

副主编：王正树

执行主编：田雨海

搜索碑：田世升 刘建武 宋福荣 武俊川

拓碑：刘建武 田二保 李贤龙

碑文抄录：王建国 冯玲 武静

简介撰文：刘建武

断句标点：刘建武

校对：梁荟名 薛文娟 王晓丽

照相：刘建武

凡 例

一、以抢救和存史为收录原则。收录范围：以《三晋石刻总目》为基础，凡古代、近现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现存和佚失石刻全部全文收录（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社会文化价值的私人墓碑等除外）。收录上下限：上限从本地最早的石刻起，下限到定稿为止。

二、以县（市、区）分卷，原则上每县（市、区）一卷，另有山西省博物院卷、五台山卷、晋商会馆卷和总目各一卷。

三、“概述”为一个县（市、区）或石刻收藏单位总论性的文章，既有资料性，又有学术性，内容主要包括：石刻历史发展（收藏）演变情况、现在分布区域、类别、时代、数量和保存情况，重要石刻简述、主要特色和价值评估、保护和利用建议等。

四、石刻单位称谓：各类碑刻（包括造像碑）一律称“通”；石碣（或刻石），称“块”或“方”；经幢（包括石幢）称“尊”；墓志和墓志铭，有盖的称“盒”，无盖的称“方”；画像（图像）石、匾额、塔铭、法帖，称“方”或“块”；摩崖题记称“处”或“条”。石柱，称“根”；戒牒，刻在碑上的称“通”，刻在碣上的，称“方”或“块”。石刻录文称谓：碑，称“碑文”；碣（刻石），称“碣文”或“刻文”（镌刻诗赋的，称“诗文”）；造像碑（含座），称“发愿文”；墓志铭和墓志，称“志文”；石匾，称“匾文”（镌刻帝王诏令的，称“敕文”）；摩崖题刻、画像石、石幢（内容非经文者）、石柱等，称“题记”或“题刻”；经幢，称“经文”；塔铭，称“铭文”；墓表，称“表文”；石对联，称“联文”；戒（度）牒，称“牒文”；法帖，称“帖文”。

五、不设篇、章、节，一件石刻独立成篇。全卷录文分两部分，即现存石刻、佚失石刻。以县（市、区）为纲，分别按时代顺序排列，不分类。

六、每件石刻编纂内容包括“名称”（全称）、“简介”、录文（全文）。另附照片或拓片。

七、凡涉及人物的石刻，“简介”除介绍石刻外，还应介绍人物的生卒年、籍贯、主要官职、生平事迹、著述等；凡涉及人物籍贯的，一律用原地名，括号内注明今地名。如郭泰，太原界休（今山西省介休市）人。

八、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不少石刻陆续由原址搬迁到异地，这部分石刻均以现收藏单位收录。地址一律按原址书写，然后注明搬迁时间和地点。

九、真假或断代暂无定论的石刻，可沿用旧说或存疑。有几种说法的，诸说并存。

十、纪年：1912年以前的石刻一律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唐贞观元年（627）。括号内公元年号前后不加“公元”和“年”字。1912年以后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律用民国纪年，括注公元纪年，如中华民国16年（1927），也可写成“民国16年（1927）”。民国年号用阿拉伯数字，不用汉字。1949年10月1日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一、表示体积、面积等尺寸的，用“厘米”。如长（或高）120、宽60、厚80厘米，长、宽

均不加“厘米”二字，用顿号间隔。

十二、收录的石刻文字原为繁体字的，仍用繁体字；原为简化字的，仍用简化字。1957年汉字简化之后，有的碑繁简混用，录文尽量保持原貌，以保存史料的真实性。

录文横排，原则上根据文意分段，不易分段的，可以连排。编者所加文字，用楷体字，并加圆括号，以与正文宋体字区别。如“(碑阳)”、“(碑阴)”等。

十三、收录的石刻文字，只作标点，不作校勘，原文中的错别字、异体字、通假字及不当之处等，保持原貌，不作甄别、注释和加括注。

十四、石刻文字漫漶、剥泐不清的，用一字一“□”表示。漫漶、剥泐字数不清的，用“……”或“下阙”表示。

十五、索引按类编排，使本书既可按历史顺序阅读，又可按类检索，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总序

李玉明

石刻,指镌刻有文字的历代碑、碣、造像碑、经幢、石幢(内容非经文者)、摩崖题记、墓志铭、画像石等,是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石刻,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狭义的理解,专指“碑”;广义的理解,包括碑、墓志、造像等各类刻石。

所谓“碑”,汉以前就有了,但那时的碑不是为了刻字,而是立于宗庙、学校,用以观日影、记时刻、测方向的。古代礼仪规定,主人迎宾进宗庙之门要当碑而揖。祭祀时亦常常把祭祀用的牛羊等牺牲先拴于碑上。碑在古代还有另一种用途,是立于墓前用于棺木下葬,称为“窆石”。下棺时用以固定轭轳,所以早期的墓碑中上部有穿,称之为“碑穿”,用以系绳下棺;在宗庙之碑则为系牺牲的牛羊所用。因此,最初碑的用途并非为了刻字,而是实用。

现代意义上的“碑”,兴起于西汉而盛于东汉。原来在西汉以前,即商周时期歌功颂德的文字铸刻在钟鼎彝器上,西汉开始以石代金,用碑记载功德和事件了。这即是金石铭文的由来。

从西汉“碑”开始镌刻文字以来,历朝历代的碑刻大体相似,均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但各类碑之间又呈现繁多的样式。碑头有圭首、圆首、平首、梯首、冠形首、螭首等。碑身以长方形为多,另有倒瓶形,六棱、八棱形,正方柱形,扁方形等。碑座有龟趺形,形状庄重,采用得最多。古人以龟为长久,常常以龟(实际称赑屃)背碑。碑的内容有功德碑,记载文臣武将的文治武功;庙碑,种类繁多,记述庙的修建历史;墓碑,记载死者籍贯、世系、事迹及卒葬时间等。还有记事碑、纪念碑、文告碑、诗文碑等。

从现代广义上讲,凡是镌刻有文字的石刻都可以称为碑刻,而在先秦时除“碑”以外,其他都不称碑,而称“刻石”。迄今我国发现最早的刻石是商代的《小臣系毁》和一些石磬刻字。以后有秦石鼓文,秦始皇峰山、泰山、琅琊台刻石等。汉以后这些刻石逐渐统称碑石了。佛教传入中国和中国道教兴起后,又出现了宗教刻石及造像。山西是我国中原地区宗教刻石最早产生和发展的省份之一,云冈石窟、天龙山石窟,以及现在散存在全省各地大量的经幢、石幢、造像碑等刻石,见证了这一历史发展的轨迹。另外,作为墓碑衍化物的墓志,起源于汉代,形制为长方形。而标准方形的墓志则兴起于魏晋南北朝,大盛于唐,是碑刻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山西现存的北魏司马金龙墓志,封和宠、辛祥墓志;北齐裴良、庾狄回洛、娄叡墓志;东魏刘懿墓志等。

石刻最大的特点,是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故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简称“石史”。它最大的功用,是可以证史、补史和纠正官修书面历史记载的舛误,在弘扬民族文化,借鉴历史经验,在为社会主义政治、物质、社会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历来受到地方当局、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爱好者重视。例如,我国现存最早最大的殿堂式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经幢,解决了该殿学术上的两大问题。一是根据经幢的记载,该殿始建于唐德宗大中十一年(857),不仅使该殿是唐代建筑得到了有力的佐证,而且使这座国宝级文物建筑有了准确的纪年,其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二是从这幢经幢的记载中得知,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即捐资人)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宁公遇”。由于施主的身份高,其建筑的级别也相应被提高。又例如,山西现存一万八千多处古建筑,其每处建筑的历史沿革,要么文献记载简单,多数只一句话;要么查不到任何记载。而这些建筑前前后后的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主要靠现存碑刻的记载来解决,因而各座古建筑附属的碑刻就成了该古建筑历史沿革有力的证据。再例如,山西历史上的灾荒不断,元大德七年(1303)平阳、太原地区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清光绪三年(1877)曾发生过山西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旱灾,连续三年颗粒无收,死亡百姓不计其数,并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些灾荒,由于历史的原因(如

信息不畅),或是地方官员为保乌纱帽,有意隐瞒,因而文献记载零碎简单,甚至缺失无记载。而民间百姓在灾荒过后却镌刻了不少碑刻,使后人永志不忘。这些灾荒碑虽有不少毁于战火,或被人为破坏,但各地保存至今的仍有不少,已成为研究山西历史地震、水旱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除灾荒碑外,存世的还有不少古代科技方面的碑石,是研究当地农林水利、医药等发展的重要实证。三晋石刻是我省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人文资源。因此,编辑出版《三晋石刻大全》,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是功在千秋、荫及子孙的一件好事、善事。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以来,访求石刻是历代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们的终生爱好和追求。山西自明成化十年(1474)创始《山西通志》时,就收录了“金石”资料,现在能够作为代表的是清光绪年间山西巡抚胡聘之主编的《山右石刻丛编》。这套《丛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出版,共40卷,收录北魏至元代计14个王朝840余年的各类石刻720通(件)。还有在此之前于光绪十八年(1892)官修的《山西通志·金石记》(单行本称《山右金石记》),杨笃(秋湄)主编,收录汉以来碑刻1550余通。《山西通志·金石记》与《山右石刻丛编》比较,前者“有则录之,存亡不计”,后者“存者收录,亡者不述”。

山西历史上石刻最多时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文物部门的多次调查和普查,山西现存各类碑碣大约两万。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说:“大抵晋碑皆萃于蒲、绛、泽、潞四属。”四属原都称州,大体上是现在的运城、临汾、晋城、长治四市,即山西南部地区。《山右石刻丛编》收录的720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496通,占全省的68.9%;《山西通志·金石记》收录的1550余通碑刻,属于上述四州的有993通,占全省的64%;现存的两万余通石刻中,上述四市占了全省的一半以上,叶氏的论断基本是正确的。但除上述四州(四市)外,其他地区也有不少碑刻存世,其中不乏精品,同样应予重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文物考古部门和有关部门、团体,以及个人爱好者在石刻的调查、保护、拓印、研究、出版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些成果比较零星分散,缺乏全面性、系统性;也没有一个专门访求石刻的机构,使这项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制约。其次,历史资料少而缺失,已出版问世的石刻著作,存量极少,不仅难求,而且收录不全。比如,《山右石刻丛编》和《山西通志·金石记》均只收录到元代,且遗漏不少,大量明清时期的碑刻未被采摭,造成历史的遗憾;宋代赵明诚的《金石录》只收录山西唐以前碑石45通;清代王昶的《金石萃编》,只收录山西元以前碑石近30通。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第三,建国以来又新发现了大量的石刻,特别是新发现和出土了一批重要的墓志铭、摩崖题记、造像碑等,大大丰富了山西石刻的研究资料。比如北朝至隋唐一批重要墓志的出土、黄河沿岸等处汉以来漕运摩崖题记和一批早期造像碑的发现,以及其他一大批新发现石刻的著录登记等,都是重要的石刻资料,这些都需要有人去进一步访求和研究。第四,石刻文物具有不能再生性的特点,毁一件即少一件。比如北周武帝二次灭佛,山西的汉碑及三国两晋碑除郭泰碑外,全部被毁。郭泰碑后来也流失不存,造成了“山右无汉碑”的历史遗憾。当前仍存在盗窃和建设工程中人为破坏石刻文物的严重现象,自然损毁也日益加剧,古老石刻随时都有流失和被毁的危险。因此,抢救保护石刻,将其全部著录在册,世代流传下去,是当务之急,是带有抢救和存史双重重要性质的宏大工程。

为了全面系统地开展三晋石刻的访求和研究工作,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即借鉴历史经验,适应形势的需要,挑起了保护研究石刻传统文化这个重任。从1990年开始,即着手分市编辑出版《三晋石刻总目》,到2006年底,已有9个市《总目》正式出版,共收录存碑11878通,佚碑4168通,合计16046通。

在基本完成《三晋石刻总目》编辑出版的基础上,从2007年正式开始编辑《三晋石刻大全》。《大全》以《总目》为基础,将新中国成立前后不论存佚,有文则存,全文抄录,并断句。同时,每篇加“简介”,附照片或拓片。基本上每县(市、区)1卷,山西博物院和五台山、晋商会馆各1卷,再加记事总目录1卷,全省预计125卷。

分步编辑出版的山西石刻研究成果,其资料价值、历史价值、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将远远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有史以来的首创之作,流芳后世,意义深远!

是为序。

序 一

刘光彦

吕梁地区组建于1971年,2004年撤地设市,辖一区十县,代管二市,总面积21095平方公里。位于山西省中部西侧,黄河东岸,介于北纬 $36^{\circ}43'$ ~ $38^{\circ}43'$ 和东经 $110^{\circ}22'$ ~ $112^{\circ}19'$ 之间。西隔黄河与陕西相望,东与太原市和晋中市相邻,南与临汾市接壤,北与忻州市为邻。

吕梁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经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类进化的历程。史前人类足迹遍踏吕梁,石楼殷商方国、柳林高红商城等在吕梁建立,五千年华夏文明有其一席之地。春秋战国属赵,独领风骚,成为晋文化的一朵奇葩。秦汉魏晋,隋唐宋元,离石西河古郡、方山南村“左国城”等出现,成就了吕梁文化遗产的特色。明清商人艰苦创业,出关越境,省内外闻名。近代吕梁,红军东征、晋绥边区,享誉中国。

延绵不断的吕梁文明史,积淀了博大丰厚的历史遗存。吕梁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有5901处通过国家验收。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共1548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436处。全市还有全国历史文化名镇1个,全国历史文化名村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6个。

保存于5901处不可移动文物内的石刻,不仅门类齐全,而且跨越时间长,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由于自然风化、地震、人为损毁等原因,吕梁的石刻在1949年前就损失不少。新中国成立后,战乱兵燹虽成历史,但古老石刻流失和被盜被毁现象仍未绝迹。如今吕梁的石刻除少数保存条件较好以外,大部分或矗立于乡间小庙,或倒卧于荒野蔓草之中,或已散落民间被挪作他用,随时可能遗失。吕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在省三晋文化研究会的指导下,组织各县市区三晋文化研究会编纂了《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各县(区)卷。其中,辑录了上自北齐下至民国的各种石刻存碑共计3500余通,佚碑500余通。虽不敢言已全部收录和发掘,但不失为一笔宝贵财富,对挖掘、弘扬吕梁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石刻大部分是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大多数碑碣上的文字,是一种公开的地方历史档案。与传世文献相比,石刻文字更具有地方性与民间性,往往直接记述了当地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重大历史事件。因此,它是区域历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这次由三晋文化研究会发起编纂的《三晋石刻大全》,以县域为单位,每县一卷。石刻编选时间下限截至每卷定稿。无论编选范围还是时间跨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目的是进一步保护古文化和泽被后人。

吕梁市境内现存石刻中,重要者略述如下。

离石区的《重建汉光文帝庙碑》,记述刘渊于“泰始(西晋武帝司马炎元年265—274)之后,建国成邦,再不可言,后谥汉光文帝,此处建立行宫”的史实,大元至元二年(1336)岁次丙子仲夏立;《明通义大夫兵部左侍郎赠工部尚书襄敏张公墓志铭》,主要记载了张珩的生平,还有他总督陕西三边,以文吏而擅武略,屡著奇功之事,嘉靖三十九年(1560)立石;《五岳真形之图碑》,现存于北海山巅玉皇庙,记载了《五岳真形之图》的有关事宜,明嘉靖十七年(1538)立石;《芦则峁石碣》,主要记述于准自归田后,承先志择势而建莱公别墅,以志先人之志,乐先人之乐的情趣。由清代于准撰,清雍正五年(1727)九月立石;《左国郎单于所徙庭经幢》,记载了刘渊为“冒顿之后……今离石左国郎单于所徙庭也……泰始之初,建国成邦,后谥

汉光文帝,此处建立行宫,立其庙”等重要史实,大元至元十七年(1280)立石;永宁州知州陈韶建书的《永宁州东界碑》,位于离石区吴城镇上三交村竹框里自然村东约2千米,嘉庆十一年(1806)春月立石。

临县的赐同进士出身赵中元撰文的《东岳山文塔铭记碑》,记载了文塔的环境风貌和修建事宜,清乾隆二年(1737)立石;永宁州知州王继贤撰文并书丹的《重修黑龙庙碑》,记载了磧口黑龙庙重修事宜,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立石;太子太保、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陕甘总督部堂、一等恪靖伯爵、加一等轻车都尉左宗棠书的《张公济远墓志碑》,记载了张公济远生平,清光绪三年(1877)立石。

柳林县的《重修佛殿碑》,记载了重修佛殿的经过,宁邑岁进士惠迪吉撰,清乾隆八年(1743)立石;《五十二村修桥碑》,记述了沙曲等五十二个村共同修建桥梁的经过,还凿刻了当地4大村、8小村及124个自然村村名,嘉庆二十三年(1818)立石;《谢雨碑》,记述了吴村东塔上自然村大旱求雨的事迹,清嘉庆十年(1805)立石。

中阳县的《柏洼山傅山石刻》,记载了傅山游柏洼山时住龙泉道观介石山房的事实,清康熙十三年(1674)立石;《柏洼山王继贤石刻》,记载了永宁州知州王继贤公事繁忙,抽空游柏洼山时的感受,清道光五年(1825)凿刻;《重修吴王庙碑》,记载了重修吴王庙的艰辛情况和“乾隆戊午季冬十一月二十四日”始当地地震数日,震塌庙宇建筑和损毁塑像的有关情况,这通碑为研究中阳县乃至吕梁市地震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清乾隆十一年(1746)立;《高守谦墓碑》,记载了奉政大夫,曾任陕西西安府同知前授銜承德郎直隶通判高守谦的生平,立于明天启二年(1622),由“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前都察院学院事左都御史治生孙伟”题;《南大井界碑》,为明正德年间宁乡县(今中阳县)与孝义县(今孝义市)地界碑,明正德十三年(1518)立石。

交口县的《韩极墓碑》,记载了韩极生平及其商业活动,清咸丰五年(1855)立石。

岚县的《丁瑄墓碑》,记载了明故赐进士出身按察司佥事陞奉议大夫丁瑄的生平及丁氏家谱,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立石。

方山县的《于成龙墓碑》,记载了直隶巡抚、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于成龙的生平及政绩情况,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立石;《福胜庵石碣》,永宁州知州王继贤书。

交城县的《平寇六律摩崖石刻》,主要记载了交城知县赵吉士镇压交山农民起义得手后,在惠家庄军营所作六首律诗,六首律诗记述了镇压农民军的经过,清康熙十年(1671)刻凿;《古罕碑记碑》,主要记载了赵吉士任交城知县伊始,即整治交城名胜却波湖环境,清康熙十二年(1673)立;《申家庄真武庙重修碑》,主要记载了民国初年捐资重修申家庄真武庙的事实,其中捐资者包括汉口、东口、沙市、甘肃、榆邑、寿邑等地商号数百家,是研究民国初年这些地方商业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文水县的《甘泉常稔渠水程碑》,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主要内容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甘泉常稔两渠,因争水酿出人命,后官府出面调解纠纷,并按乾隆年间所分水程重新立碑划分水程的事实。另外,该碑还记录了当年两渠的走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碑由甘泉、常稔两渠渠长呈头所立。

汾阳市的《北齐崇圣寺造像碑》,碑阳上下各开一龕,上龕一佛二弟子,龕外线刻力士像,下龕一佛二菩萨,北齐天保三年(552)立石;《梅君墓志》记载了墓主人梅渊生平,书法极好,隋开皇十五年(595)立石;《郭君之碑》,记载了郭君随李世民征战的生平事迹,传为虞世南所书,唐乾封二年(667)立石;《曹君墓志》,记述了唐时中亚人在晋的活动现状,唐永徽六年(655)立石;《大唐故宋府君墓志铭》,记载了墓主人宋胤生平,志文可证早在唐开元二十三年(735)时现在的汾阳也称汾阳;《旌忠元勋之碑》,记载了狄青生平,宋仁宗赵祯篆额,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尚书礼部郎中王珪撰文,宋嘉祐七年(1062)立石;《金王庭筠诗碣》,碣文为四首七绝草书,若行云流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金代著名书法家王庭筠赋并书,书于金代大定十三

年(1173)前后,明代嘉靖年间模勒;《嘉议大夫礼部尚书河东郡侯谥简肃吕公神道碑》,记载了简肃吕公生平,碑文由国史院官虞集撰,集贤大学士冯思温书,元至正七年(1347)立石;《申明亭酒泉记碣》,碣文记载了上世纪初汾酒获得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中华民国6年(1917)中秋日立石。

孝义市的《唐奉诏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主要记载了大孝堡临黄舍利塔藏经记事,唐贞观元年(627)勒石;《唐朝上轻车都尉梁石寸之铭》,主要记载了梁广身世及生平,唐调露元年(679)勒石;《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墓志铭》,记载了霍冀身世及生平事迹,明万历五年(1577)勒石;《重建中阳书院碑记》,主要记载了孝义县(今孝义市)重建中阳书院之事,清同治六年(1867)勒石。

除以上重要的碑刻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先辈们也留下了大量的碑刻,这些都是今天向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资料。

《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各市县(区)卷的编纂工作得到了吕梁市委、市政府以及各县、市(区)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才使这项工作按照预期的进度圆满完成。我们相信,《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各市县(区)卷的出版发行,不仅是对全市范围内石刻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对于文化强市、文化强省也具有重要意义。

序 二

中共孝义市委书记 张旭光

孝义市人民政府市长 郭保平

碑，可能是中国最多、最具华夏文化特色的文物了。

现在见到的最早的古碑实物，大概就是1996年从河南新郑县出土的战国时期韩国故城宗庙遗址的“无字碑”了，此碑被誉为“中华第一碑”。但是，此碑与汉代之后的碑，其用途及意义是不大一样的。最早的碑通常有三种用途，或立在宗庙堂的门前用于拴牺牲；或竖在宫殿前观察日影移动，用于测定时间；或竖于墓穴四角，碑头凿个圆孔，曰“穿”，用于将捆绑棺槨之绳穿过圆孔，借助碑的支撑，把棺材缓缓放入墓穴之中。自西汉始，古人将死者的姓名、埋葬的时间等均记录于碑，碑亦不再同棺材一起置于墓穴，而是留在墓地，成为一种纪念性标志物。后来的墓碑就是从此演化来的，碑之材质也由最初的木质改为石材，人称石碑。

东汉以后，碑的用途越来越多，碑刻之内容亦越来越丰富，刻碑风气日盛。魏晋时期，朝廷明令禁碑，刻碑之风受到遏制。直到唐代，风气复盛，所以遗存于世价值连城的古碑，以汉代与唐宋为多。逮至明清，风气盛而不衰。因此历史名碑和书法名碑大都出自这几个朝代。

自宋代兴起“金石学”，众多史学家、方志学家、文化学者将访求石刻作为终身爱好与毕生追求。到清代又兴起“碑学”，以致成为世人瞩目的“显学”。凡是学习、研究和以史为鉴的人，无不重视石刻碑文的历史价值与认识功能。大量的石刻碑文因是刻在石头上，故被称为“石史”。“石史”既是证史、补史和纠正文献记载舛误的珍贵实物资料，又能长久地保存下去，所记载的历史事实和事件比较真实可靠。所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古碑的保护与抢救受到空前的重视。保护古碑就是保护珍稀的历史文物，抢救古碑就是抢救不可再生的传统文化。自然，对三晋大地上的石刻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编纂出版《三晋石刻大全》是一个抢救性的工程和传承中华文明的工程。而这一工程的宏大与史无前例的性质，必然决定，《三晋石刻大全》是一部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将超过以往出版的石刻著作，将成为山西旷世的首创之作，功在当代，利及千秋。

三晋文化博大精深，“孝”“义”文化源远流长。孝义从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594）置县至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全国有记载的置县历史最早的九个县之一。追溯孝义的石刻文化，自庙祀三皇开始，古迹遍布，贤哲辈出，民风淳厚，人文馨芳。诸如庵、观、寺、庙、亭、台、楼、阁，或故地、祠堂、桥道、民居、名山大川，到处可见石刻碑文。或记创建修缮，或述名人轶事，或写开渠灌溉，或撰兴学办校，或叙民情风俗，或录敕命牒文，或载革命烈士，种种石刻，铭功记事，流芳百世，成为形式多样，种类齐全，记载内容广泛的一种特殊的文献史料，蕴含着丰富而深厚的“孝义”文化。

孝义市文物局和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经过数年的实地调查，检阅资料，走访群众，冒严寒，顶酷暑，爬高山，去山乡，拓片装裱，拍照，抄录碑文，反复查对编辑，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十分可贵，令人敬佩。现在，在省、市三晋文化研究会的关心支持下，《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孝义市卷》即将出版，这无疑是孝义有史以来第一部全面反映县域内古今石刻资料的旷世之作，也是孝义文化建设上的一件盛事。可喜可贺，意义深远。相信本书的出版，将对宣传孝义的历史，弘扬“孝”“义”文化，推进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建设区域性中心城市，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概述

孝义市隶属山西省吕梁市，位于山西省中部的晋中盆地西南隅，背依吕梁山，面俯汾河水，北与汾阳市为邻，西北与中阳县相依，西与交口县接壤，南与灵石县相连，东南与介休市隔汾河相望，素有“三晋之宝地，秦晋之要会，吕梁之窗口”的美称。境域东西直线最长为46公里，南北直线最宽为26.55公里，全市国土面积为945.8平方公里，辖七镇五乡四个街道办事处，379个行政村，总人口44.6万，2011年位居全国县域百强县市第66位，是全国县域经济发展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县市之一。

孝义历史源远流长，早在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是山西历史上置县最早的地方之一。《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记载的晋景公赏士伯以“瓜衍县”，即春秋周定王十三年（前594）始置瓜衍县。其实，在这之前，很早就已经有“瓜衍”城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山西名胜志》卷七记载：“瓜衍在县北十里，本虢城也。相传晋灭虞虢迁其人于此，乃筑城以居之。”

瓜衍县的旧址在今孝义市北的虢城村，古代又称此地为“瓜城”。至今当地百姓还把流经附近的虢义河称作“瓜衍河”。瓜衍县是目前史料记载中我国最古老的县名之一，是“县”从最初的因地划分单位到居民组织、功臣封地，并成为行政区划名称逐步过渡中的一个活化石，它影响到秦王朝及后来集权统治形式郡县制的诞生。所以，余秋雨先生才说：“民族文化中的很多起源性的东西都与山西这块土地有关。”

古时中国朝代更迭频繁，孝义也随着皇朝的变更几易其属。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孝义县又属兹氏县城，位于兹氏县南境。东汉末，南匈奴王部入居离石、中阳等地后，三国曹魏政权迁中阳县治于孝义旧城，故置此为中阳县。西晋永嘉元年（307）战乱后，中阳县废，孝义县境并入隰县。北魏时期，今孝义市境成为魏军抗击吕梁山区“山胡”侵扰的前沿阵地，魏政权设于今孝义六壁府，置军镇于六壁城，以“防离石诸胡”。《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云：“六壁府在县西南十五里，俗以城有六面故名。《后魏书》太平真君五年讨胡贼于六壁，即此城也。”但史料中也说：“六壁者，县所辖贞壁、贾壁、白壁、许壁、柳壁并六壁为六，故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大明一统名胜志二八〇卷目录一卷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也记载：“西河有中阳县，俗名向阳峡，崖险插天，中断中辟，延袤二十余里，为汾石咽喉。汉晋皆置关守之。洪武初置巡检司。隆庆元年九月十五日，北虏自此入侵。”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又将孝义境从隰县分出设置永安县，县治在今孝义市旧城。“永安”的命名反映了魏政权祈望平息山胡侵袭，希望社会安定的意愿。但至北魏孝昌年间，积累已久的社会矛盾再次引发了边镇暴动和各民族暴动，汾州山胡刘蠡升乘乱称天子。永安、隰城二县被“胡贼所破”，二县治所被迫迁至今临汾市境。为应付这一混乱局面，魏政权又在六壁故城置建平郡，在今虢城村置定戎郡，盼望这里“平”与“定”。隋统一后，今孝义市境又恢复永安县旧名，属西河郡治。

唐贞观元年（627），因县名与涪州的永安县（今重庆奉节）重名，遂产生更名之议。因郑兴以“孝行闻于朝”，于是唐太宗李世民敕赐改永安县为孝义县，改郑兴所居的故里为大孝堡。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又曾一度改称为中阳县，熙宁五年（1072）改县为镇，不久又复置孝义县，此后县名即一直沿用“孝义”两字。两字使用，至今已有1380年之久。1958年曾一度并入介休县，1961年复置县。

孝义自古以来就是商业重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商品集散之地。《中阳楼并永安市场记》中记载：“自汉唐，西河郡孝邑为一方重镇，车骑缤纷，商贾麋至。”兑九峪镇则是晋西和陕北的“聚粮之码头”，商队来自晋、冀、鲁、豫、甘、宁、新、蒙，商旅涉及京、津、沪、杭及关外，至民国15年（1916）成鼎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二十世纪50年代末期，水峪、柳湾、高阳等国统煤矿开始建设，铁路介西线建成通车，物资流量增大，并承担起晋西、陕北粮食物资的输运任务。70年代初，省、地驻市单位骤增，吕梁地区商业、供销、物资批发转运单位纷纷建立，孝义成为新的商业物资集散中心。199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孝义县设立孝义市。自此以后，孝义的城市功能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孝义市城区不仅成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且

成为晋西、陕北物资集散地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昔日的历史古城，又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孝义境内古迹众多。据2008年9月至2009年7月在全市进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实地调查结果显示，共有不可移动文物571处，其中复查136处，新发现435处，消失25处。新发现量占普查总量的76%。在这些不可移动的文物中，既有中阳楼、天齐庙、三皇庙、慈胜寺、临黄塔等国家、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又有不少传统民居较多的古村落，还有水利设施等新的文化遗产。所有这一切形成了厚重的文化沉淀。在孝义境内，古庙宇随处可见，可以说有村就有庙，而古碑石也大多存于古庙，所以碑石也遍布全市。孝义古县志中曾刊载碑文七十四篇，现在仅存实体两通，一为明万历三十二年《洪露渠碑记》；一为清同治六年《重建中阳书院碑记》。1992年出版的《孝义县志》，碑文辑录也有26通，均为孝义历史上著名的重要碑刻。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全市现存大小古碑碣486通，佚失54通，分布在孝河义水三百多个地方。这些碑刻，从时间上看，目前发现最早的碑刻为唐贞观元年（627）勒石的《唐奉诏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距今已有一千多年之久。从类别上看，有碑碣、经幢、石刻花柱、石刻对联、石刻旗杆、石雕佛像、壁玺、柱基等；从种类上看，有功德碑、记事碑、纪念碑、造像碑、经幢、画像碑、救命碑、家谱碑、墓碑、墓志铭、故里碑等等。总之，是一批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

全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为“现存石刻”，收录现存的唐代以后的石刻文字488篇。其中，民国前的石刻文字有382篇，新中国成立后的石刻文字有106篇。另一部分为“佚失石刻”，收录宋代以后的佚失碑文64篇。这些石刻碑文为孝义的历史研究和经济建设提供了确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使用价值，被史学界誉为“会说话的石头”和“储存历史记忆的容器”。譬如元代和明朝的《魏文侯墓碑》、乾隆五十三年年的《重修南门石记》等，对考证孝义之由来，孝义县变迁等都是最好的史料。乾隆八年的《重修三皇庙碑记》、乾隆四十年的《重修财神庙并迁建戏楼碑记》，对研究山西剧种和孝义的戏剧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依据。同治六年的《重建中阳书院碑记》，民国6年的《孝义西北区建设初高学校碑记》，民国12年《增建校舍碑记》，民国19年《孝义第一区居义村初级小学校常年经费基本地庙碑记》，以及下栅乡民国20年《创建下栅村子女学堂碑记》等，都是考证孝义教育发展史重要而可靠的依据。明万历三十二年的《洪露渠碑记》、清咸丰七年的《任马渠开普官事碑》，以及清光绪三十年的《地庙钱粮灌溉分配碑》等，都是研究孝义水利发展历史的重要资料，尤其是新近发现的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唐上轻车都尉石才与夫人李合葬墓志铭》，写道“魏国故都城西十里”，这对“孝义是魏国的国都”之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使孝义先秦史的研究有了一个大的新进展。还有建国后的一些碑刻特别是新世纪的好多石刻，深刻生动地记录了孝义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六十多年的辉煌变革，尤其反映了孝义争创“吕梁领先，山西一流，全国百强”的精彩华章，强烈地体现了孝河儿女“行孝仗义，包容大气”的传统禀赋和人文精神，为孝义实现“三年打基础，五年新腾飞”发展战略，加快转型发展、跨越发展步伐，建设富裕、文明、和谐的新孝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总之，本书收集的这些石刻文字意义非同一般，已经成为孝义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目前我市十分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研究孝义历史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由此可见，现存的这488通石碑也是非同一般的珍贵。然而现在对石碑的破坏又相当惊人。就在整理这部书的时候，有的碑我们前面抄录时还在，后面去拓印时却已不见了，人为的埋没损毁十分严重。可见，保护已有的碑石已成为当前一件最为重要的事情了。保护碑石应当说是一件无愧先辈，有益后人的大好事。愿我们所有的人，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共同努力去保护现存的石碑，让它们与这本书所收录的石刻文字一样，永垂不朽，与世长存。

《三晋石刻大全·吕梁市孝义市卷》编委会

目 录

凡例

总序	李玉明
序一	刘光彦
序二	张旭光 郭保平
概述	编委会

上编 现存石刻

●唐·宋·金·元

唐奉诏释□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唐贞观元年)	(五)
唐故处士董君墓志铭(唐代)	(九)
唐朝上轻车都尉梁君才之铭(唐调露元年)	(一〇)
唐故朝请大夫行遂州唐兴县令上柱国辛公墓志铭并序(唐天宝七年)	(一一)
尚家庄村为国敬造长明灯台经幢(唐建中二年)	(一二)
大宋国汾州孝义县李府君墓志(宋至道二年)	(一三)
大宋故朝奉郎守太子中舍致仕上轻车都尉赐绯鱼袋田府君墓志铭(宋元祐五年)	(一四)
创造龙宫海藏碑记(金明昌元年)	(一六)
苏家庄村法性禅院敕额之记(金泰和七年)	(一七)
重建迦旃延塔记并序碑(金代)	(一九)
重修黑龙池记(元至治元年)	(二〇)

●明

庆成王圻志(明宣德五年)	(二五)
补修岱岳庙记(明成化十九年)	(二六)
起盖观音堂记(明弘治十八年)	(二八)
明故文林郎鄱陵知县任公暨配阎氏张氏合葬墓志铭(明嘉靖八年)	(三〇)
明故征仕郎刑科给事中任公孺人武氏合葬志铭(明嘉靖十八年)	(三二)
明故张母岳氏墓志铭(明嘉靖二十年)	(三四)
三教堂碑记(明嘉靖二十九年)	(三五)
神宁沟村重修清泉寺碑(明嘉靖三十八年)	(三六)
重修庙记(明嘉靖三十九年)	(三八)
国子生任公墓志(明嘉靖四十三年)	(三九)
明故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墓志铭(明万历五年)	(四一)
李兴日墓志铭(明万历五年)	(四三)
资政大夫兵部尚书思斋霍公暨元配诰封夫人张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十一年)	(四四)
明敕封文林郎王君并孺人张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十九年)	(四六)

苏家庄村东岳庙新塑龙床供桌碑记(明万历三十一年)·····	(四七)
明故鸿胪寺序班的玄张公暨元配武氏合葬墓志铭(明万历三十九年)·····	(四八)
小恒村水利碑(明万历三十九年)·····	(五〇)
三多村寂照寺题刻(明万历四十二年)·····	(五三)
三多村寂照寺修住所碑记(明万历四十五年)·····	(五四)
隰州县索里西沟村洞则沟观音堂记(明天启四年)·····	(五五)
高阳村马王庙碑(明崇祯三年)·····	(五六)
苏家庄村修寨碑(明崇祯十年)·····	(五七)
明待赠儒官张公梧苔先生墓志铭(明崇祯十年)·····	(五九)
原任江西饶州府通判懿安先生张公暨元配任孺人合葬墓志铭(明代)·····	(六一)
明故处士张公配吕氏墓志铭(明代)·····	(六二)

●清

白衣观音存祀记(清顺治二年)·····	(六五)
胡家窑村娘娘庙供油题刻(清顺治十二年)·····	(六六)
东小景村重修洪济寺碑记(清康熙八年)·····	(六七)
赵家庄村重修五圣庙记(清康熙八年)·····	(六九)
重修善庆庵记(清康熙九年)·····	(七〇)
重修慈胜寺碑序(清康熙十一年)·····	(七一)
恒兴堡村堡门匾(清康熙十四年)·····	(七四)
重修天王殿壁记(清康熙十六年)·····	(七五)
重修关帝庙碑记(清康熙十九年)·····	(七七)
重修宏佛寺碑记(清康熙二十年)·····	(七八)
善吉村重修关王庙布施碑(清康熙二十九年)·····	(七九)
重修观音堂记(清康熙二十九年)·····	(八〇)
启建观音庵功德志(清康熙三十二年)·····	(八一)
临水村合村公议重修二郎庙施银姓名碑(清康熙三十四年)·····	(八二)
经管重修安桥碑记(清康熙四十一年)·····	(八三)
太子里村东岳庙碑记(清康熙四十一年)·····	(八四)
重修慈胜寺碑志(清康熙四十二年)·····	(八五)
重修五圣乐楼碑记(清康熙四十四年)·····	(八八)
合家勤劳碑志(清康熙五十一年)·····	(九〇)
南营村经管修门窑碑记(清康熙五十一年)·····	(九一)
重修洪福寺碑记(清康熙五十二年)·····	(九二)
重修娘娘庙碑记(清康熙五十五年)·····	(九五)
孝邑下庄关帝庙碑记(清康熙五十七年)·····	(九六)
创建行宫碑序(清康熙五十八年)·····	(九七)
创立三义庙碑记(清康熙年间)·····	(九九)
宋家庄村“安宁”匾(清康熙年间)·····	(一〇二)
重修龙天庙碑记(清雍正三年)·····	(一〇三)
重修关圣殿碑序(清雍正五年)·····	(一〇五)
老君洞增修碑记(清雍正七年)·····	(一〇七)